



王永炎

Wang Yongyan

王永炎 中医内科学专家。1938年9月29日出生,天津市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教授、主任医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中医内科学的研究、教育、医疗。主要研究方向是中风病与脑病的临床研究。通过对缺血性中风系统临床研究观察,总结了证候演变、辨证治疗、调摄护理的规律。针对中风病急性期痰热症、痰热腑实证设计、研究的化痰通腑汤与清开灵注射液静脉滴注疗法,提高了疗效。获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奖20余项。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难忘战争岁月 铭刻红色烙印

1938年我出生在天津市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跟随母亲住在当时河西区汇文小学的宿舍里。沦陷后城市生活十分艰难,社会秩序混乱,为避战祸,母亲毅然带我返回故乡,现今顺义县张各庄镇湘子王各庄村,当时张各庄镇位居河北顺义、平谷、三河县的交界处,我们村背靠小华山就在其余脉的孤山脚下。1943年我只有5岁来到乡下,当时家乡一带是晋察冀第12军分辖区,而临近杨各庄日本鬼子据点常来扫荡,所以是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斗争很残酷。我的二伯父叫王近义,是八路军的村长,组织群众挖地道,筹军粮,做军鞋,积极宣传抗日,村上的人都很爱戴他。我6岁上村小学,当过

儿童团员。记得八路军反扫荡攻占过三河县城,村里杀猪宰羊给部队庆功,儿童团、妇救会扭秧歌打霸王鞭欢庆胜利,那时候我就会唱《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敌人最疯狂的时候我的二伯父和两位抗日干部被捕,捆绑在村北头庙前的树上,遭日本鬼子枪杀,其后灭绝人性的鬼子军官嘶叫着训斥那些据说是从日本应征的中学生,命令这些士兵朝着革命志士们的躯体刺杀。忽然天降一阵暴雨,鲜血顺着马车的车辙流过几十米远,烈士们胸腹部千疮百孔,真是肝脑涂地。我目睹了这一切,播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永志不忘。直至今日,追忆此情此景,缅怀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我总是激情涌动,在我遇到困难或遭遇坎坷时会给我不竭的力量,而在我取得成就时又会告诫我要谦虚,不要骄躁,鞭策我不敢愧对英烈们创下的基业。现在我已进入老年了,回忆往事,可以说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给我幼小的心灵铭刻了红色的革命的烙印,使我终生受用,永远鼓舞着我前进。

学会自讨苦吃 重视提高素质

自幼我有多种爱好,诸如唱歌、演戏、长跑、游泳、踢足球,还有下棋、钓鱼等等,更重要的是爱读书的习惯伴我至今。中学时代就喜欢科普读物,注意培养与提高自己求知的兴趣与能力,尤其是提高思辨的素质。我还读过古代数学家祖冲之的故事,喜欢数学,学会逻辑思考。当然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读过一些。中学时当过板报编辑,为此还练书法,到了大学曾做院报的责任编辑,至今数十年从不间断地做兼职编辑。中学就读于北京辅仁中学(后改为北京十三中),由于家境贫寒懂得生活节俭,养成艰苦朴素的好习惯。我上初二就加入了共青团,当过团干部,高中做过初中年级的少先队辅导员,无论学习、生活、工作都要吃苦在前,为人表率,尤其是获得组织上表扬、奖励之后,要戒骄戒躁谦

虚谨慎,从那时起我便培养自己任劳任怨、自讨苦吃的一种作风。1956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就读于医疗专业。翌年,国家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鼓励学生要敢想敢说敢干。记得“结合专业利用超声波催化药用植物生长发育”,当时引发了我的兴趣,曾夜以继日地查询相关资料,设计改进超声波发生器,吃住在实验室干了五个昼夜又延续了六个周末,在一位生理学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部分实验工作。尽管这种“搞运动的模式”做科研并不值得提倡,然而明知有难,却迎难而上,不怕吃苦而且是自讨苦吃的经历却锻炼了我。还有在实验中所得到的启迪,诸如中药材种质经超声波震荡会发生什么变化?如何思考观察这种变化?要取得有意义的实验结果,则是一件很复杂很困难的事,需要长周期的研究工作,使我懂得了提出问题、认真思考、大胆设想与具体实施的链接过程是一种科研素质的培养。

感激师长教诲 立志承前启后

我自大学本科六年毕业后,恰逢卫生部落实中医师承教育之机,即拜附院内科主任董建华教授为师。先生秉承上海名医严二陵真传,擅长诊治急性热病与内科杂病,疗效显著。先生重视医德医风,对学生要求严格,必读大医精诚,后实行之;先生制订培养计划当师生共同恪守,应刻苦钻研从不敢懈怠;追随先生临证3年,尽得真传积淀日深,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更重要处则是教我如何做“人”做“事”,自闯成才之路。先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历任全国人大六届、七届、八届常委,力主“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的方针,“文革”前后为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多次带领教学“连队”,深入乡镇为农民治病,深受群众赞誉,言传身教对我影响深刻。先生在近代西学东渐误认为中医药“不科学”,一度陷入废医存药的困境时,据理力争从不灰心。1979年以来他担任WHO传统医学顾问期间奔走于亚欧美非澳洲诸国,

宣传中医药发展史从来都不是封闭守旧的,主张求实求真开放创新,提倡将中医药优势资源与现代科技结合,我主人随地为创建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努力工作。60年代中期教我多参师襄诊采众家之长,继之送我去协和进修,学习神经内科临床及病理解剖,鼓励我开拓中医诊治脑病的新领域。回顾我的成长过程,所以能有进步的动力,确与中医大家名医的启迪、教诲、提携与信任密不可分。王玉川、王绵之、赵绍琴、任继学诸位先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我亲身体会到中医师承教育不仅是院校教育的良好补充,更是提高悟性获取精髓的最好的途径。1986年董老提名我接任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1992年王玉川老师提名我接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我双肩挑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与中国中医研究院行政主要负责人连续20年,如果说还能称职做出一份有益的工作则是在老一辈中医家的悉心呵护和广大师生的关怀帮助下取得的。老师们的雨露滋润培育了我,我当终生不忘,永远鼓舞着我忠诚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

当今,我已68岁,曾于2001年因承担国家“973《方剂》项目”首席科学家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请求辞去院长职务,获批后专心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自1986年始,带出了48名博士与15名博士后进站人才。作为校长、院长,我最看重的是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团队的建设,首先是严于律己,尊师重教甘当人梯。任何时代无论什么国度,科学家的成长是在青年时期。由于“文革”10年动乱,人才断档,80年代曾出现过急于求成培养人才,引进国外人才的倾向,造成今天科技界、教育界有些新生代急功近利、浮躁虚夸的行为不端,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因此提倡与落实良好的学风、文风与作风,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应视为责无旁贷的天职,自当竭尽全力。刻下中医药学、生物医药乃至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多是群体合作取得的,应用基础研究

与 R&D 只凭借科学家自己的激情和兴趣是难以做出高显示度的科学发现与科学发明的。当然,科研思路无疑十分重要,不可偏执。缘于此,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的创新团队的建设至关重要,需要宽广的胸怀、最大的包容与无私的关爱,这是维系团结的纽带;还有提倡敢于求真求异,发扬学术民主亦属重要,鼓励大胆提出问题,引领认真思考、精心组织、前瞻性设计、探索旧问题的“新解”和诠释中医中药学的“概念”,也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晚近我曾提出“不轻言学术思想”的见解。董建华先生和我,及我的学生三代人不过是学习古人经验,能做到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及有验于今就有收获,构建创新的系统的理论差距确很大。对学临床者,自应毫不保留地传授多年的临床经验,对学基础理论者,只是做合作教师共同研讨探求新知。我深切地体会到年青一代学人,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只要克服急功近利,诸多长处才能尽得发挥。作为教师是教育者当先受教育,我愿以学生为师,教学相长,若能做到承前启后自然倍感欣慰。

经历坎坷有益 但愿事业常青

1983 年底在国家倡导“干部四化”的过程中,我被官加三级由副处破格提拔到北京中医学院地厅级院长的职位上,而且处在改革开放的热浪之中。鉴于考核校级领导拖长 17 个月,导致教职员思想涣散纪律松弛,上任后从整顿教学秩序做起,提出“校园道路要平,教室灯光要明,上下课铃声要响”的基本要求。办大学关键是教师,核心是学科建设。职能部门的干部必须服务于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作为新上任的年青的院校长对工作的目标方向是明确的,然而问题出在根据实际情况如何去实现预期的目标。“文革”10 年动乱结束以后的高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管理干部亟需更新是摆在面前的难题。当时恢复高考后的本科毕业生只有三届,为了加大力度培养研究生,充实

与扩招大本生,管理层的人事改革直接关系到一些干部的切身的利益,由于缺乏深入细致思想工作和正确把握改革措施的操守,操之过急出现失误。任职三年被降职改任为第一副院长,实际上一度主管范围就是一份学报,保留有学报主编的位置,返回到病房和研究室,重新挑起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和 WHO 合作研究项目。回忆当时曾感到“茫然”。卫生部某位副部长来宣布决定时,先是表扬我是一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改革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进而称由于工作需要,就地改任。我何以“不职称”,诧异之后不得其“解”。适逢布置“七五”课题攻关,我与参师任继学先生出差沪宁鄂陕吉等地,多次长夜促膝相谈。他以一个老党员、老中医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身份,谆谆告诫我当自问自责,必须坚持对人民事业的拳拳赤诚之志,于困难时追求进步,对待事业不言个人成败。冷静思考过后,变一时消沉成终生动力,与恩师共同感悟人生真谛,三省吾身总结经验之后,决意卧薪尝胆,历 12 年做副职,把主要精力投入学术研究领域。这 12 年是我一生中发表论文撰写书稿最多的年月,出人才出成果迅速提高了社会知名度,于 199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真是“塞翁失马”给了我认真做学问的好机会。当 1997 年复出,再度挑起校长职务时,我切实感到经历坎坷挫折的经历十分可贵,深谙团结、学习、求实、创新的重要,作为管理者时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兼听则明,与同事多商量体现民主,对职能处部干部要尊重,要勤于向群众学习,只有身体力行做到理解、包容、关爱才能做好工作。我曾多次告诫自己“有权勿滥用,得意勿忘形”,坚持“自讨苦吃,朴实进取”的作风,“不求大红,但愿事业常青”。我是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党和国家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的环境,赋予了我们展现才能的机会,肯定我们劳动的成果,引导着我们朝向未来,我们要迈开大步去努力奋斗。

敢于求真求异 推进学科发展

继承创新,服务人类健康是中医药学科建设的目标。继承是基础,创新是归宿,为此应积极倡导敢于求真求异的精神。1983年我作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的副主委兼秘书长,在老一辈中医学临床家的支持下,选定中医药防治中风病作为攻关的领域,组建了以中壮年中医为主体的团队,首先提出为了宏扬中医临床医学优势需要有批判地继承,依据临床表现与病理解剖特征将中医内中风病定位在脑血管病范围,进而分类为出血性中风与缺血性中风;相当颈内动脉系统的真中风与类似椎基底动脉系统的类中风。重视临床疗效评价的方法学研究,制定与推广辨证量表,首次引进医学计量学探索能被国内外与中西医均认可、能推广、立得住的疗效评价方法。在全国中风病学组与攻关协作组建起中医中药的生命力在于疗效的理念。我们先从中风急症的救治方案的疗效观察做起,进而拓展到恢复期的治疗与后遗症期的康复。为了针对中风病发病年龄提前的情况,对预防做了系统研究、前瞻性设计,实施了中风病先兆症的现场防治方案。进入“九五”计划,将中风病后血管性痴呆作为攻关项目,目前已延伸到中风后抑郁症的研究。我参与了清开灵注射液早期研制工作,主持了救治中风急重症的临床疗效观察;针对中风病急性期始发态的痰热腑实证,总结了证候演变的规律,推广了星蒌承气汤化裁的化痰通腑的运用,提高了防治水平。我们还承担了WHO合作项目“脑血管病中医康复研究”,在国内外推广起到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1999年我承担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被科技部聘为项目首席科学家。晚近由化学家提出新世纪将是复方治病的时代,而我国早在公元二世纪医圣张仲景就集方剂研究之大成,他还是辨证论治体系的奠基人。中医治病历来运

用方剂,在药性理论基础上的方剂配合是凝练的科学问题,具有原创的优势,引领着国内外复方配伍的科学研究。面对老问题求新解,我提出的假说是“方剂的潜能蕴藏于整合之中,不同饮片、不同组分、不同化合物的不同配伍具有不同的效应,诠释多组分与多靶位的相关性,针对全息病证,融合对抗、补充、调节于一体,发挥增效减毒与减毒增效的和谐效应”。整合应包括药效物质与生物效应的整合,药物实体与表征信息的整合,药物功效与人体机能的整合。通过科学实验的支撑,构建了现代中药组分配伍的新模式,明确了组分配伍的概念,中国科学院还成立了中医药组分药物研究中心。项目于2004年通过验收,研制出多种现代中成药,现已发表论文600余篇,专家总体评价该项目极大地提高了中医药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市级一等奖5项,后续的成果将逐步显示出项目的水平。作为项目首席,我最大的收获是带出来一支以中医药学科为主体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团队;还有生命科学研究,模式生物的方法虽不可或缺,然而中医药科研课题需要系统论指导下的还原分析,否则海量的实验数据缺乏非线性分析方法,难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

推进中医药标准化与规范化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医药学顺应当今国家社会需求,实施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关键问题,同时是学科成熟度的标志。自1983年以来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医病案书写规范》、《中医病证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2001年组建了全国科技名词委中医药学分委员会,主持起草了中医学基本名词,现已颁布。还承担了“中药材标准与相关临床疗效评价标准”的课题研究工作。技术标准、术语规范的建设需要全行业的参与,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通过实施以后不断搜集反馈信息,逐步完善与推广。虽然医学的“标准、规范、指南”对医师与管理者是参照采用,然而其具有的权威性与约束力是不容置疑的。晚近

20余年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方面我总结了一条经验,那就是“权威性寓于普遍性之中”,只有起草者与管理者尊重广大医务工作者,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不断完善,才能发挥技术标准的作用,提高学科与行业的社会效益。

我辞去院长职务后,总结与发表了学科建设三要素等文章,指出新世纪学科建设已呈现出大学科、广兼容的发展趋势,突出了前沿学科的辐射作用,并逐步形成多学科渗透交融,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综合与分析的结合,实体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的结合,推动了科技第一生产力的进步,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重大需求。近年我国高校扩大了招生规模,亟待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学科建设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就是以承担国家科研任务为主的科研院所,今天面对体制改革,同样需要明确学科建设目标,稳定研究方向,靠自身培养优秀的高层次复合型学术带头人。因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益性医疗中心想要进入良性循环,求得稳步发展,都必须紧紧抓住学科建设,而发展目标、研究方向与人才梯队是学科建设的三要素。多年来科研以项目运作为主要模式,强调出成果,而对人才的系统培养只靠项目带动是不够的,只有重视学科人才梯队的建设,才能真正克服急功近利,应该倡导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的培养与项目运作相结合,注重长远的效应。

迎着世纪阳光 并肩和合共进

进入21世纪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医学的目标应是以科学的成果体现人文的关怀。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人文合而不同互补互动。朝向真善美最高境界的美学,必将是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真谛,运用生命科学与人文哲学的水乳交融,展示她的特色与优势,弘扬原创的思维,将成为先进文明的例证。当今医学的社会性增加了,心理学以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深且广地渗入到卫生保健的诸领域。缘于此,人们发现中医

学“调心身”的重大意义,应还其原本的面貌。还有治未病的思想理念,对于亚健康的干预将逐步成为科研热点。诚然破解验证难题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寻求科学、可行的途径已成为当务之急。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系统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令人振奋,她为中医中药研究提供了现实的方法学,亦将转化为生命科学发展的巨大的动力。新世纪中医研究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从线性的简单系统走向开放的复杂系统,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以非线性的设计落实到线性的表述,把非线性的无限目标化解为线性有限目标,逐步逼近真实、确切的结果;二是由模式生物走向人体实验,在还原分析的时代,模式生物研究对生物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今天面对复杂性疾病,单因素拮抗与补充很难获得人们企盼的疗效,医生与患者渴求中药复方的有效干预,重视运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评价生存质量与干预效果;三是由“纯粹”的科学走向与人文科学相融合。中医学有理论,其现象理论来源实践、指导临床,其天人相应、形神一体、辨证论治的理论框架具有原创的思维与原创的优势,理法方药无处不含有人文含量。2004年我曾主持过“973《证候》项目”的科研设计,提出了“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据证言病”与“病证结合、方证相应”以及“证候要素、应证组合”的主题思想,围绕着证候与疾病、方剂的相关性做中医学的一份基础研究工作。诸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五志配五脏,燮理阴阳以平为期均能体现中医理论内涵的圆融与中庸之道。新世纪我们处于技术飞速发展而理论相对滞后、亟需强化科学原理研究的时代,对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局限和一元论混沌与复杂的理论的指导应作深刻的思考。毋庸置疑中医药学是科学的,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她为现代难治病的治疗提供了可深入研究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其科学与人文双重的学科属性是具有原创思维、原创优势的学科,理应我主人随将其弘扬光大,为

人类健康事业、为生命科学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新时期的中医政策是中医不能丢,中西医并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

中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政府、老百姓与科学家对中医和中医学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笼罩在我们头上“不科学”的阴云正在消散,中医受歧视的时代将可能有根本的变化,中医界内部也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新生代在茁壮成长。本世纪初叶已是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并存的新时期,让我们融入大科学、大文化中去,为开创美好的未来,迎着阳光共进。